

太平軍在杭州

楊

州

上 周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著

122

5

3

太平軍在揚州

周 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太平軍在揚州

周 鄭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錦興路 51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1 號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2 3/16 插頁 2 字數 40,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0

統一書號：11074·93

定 价：(7) 0.26 元

封面設計 余竹君

封面題字 范一辛

序

一九五三年國慶日前揚州博物館举办太平天国史展览会，我前去参加工作。当时周郁先生担任中國共產黨江苏省揚州地方委員會宣傳部長职务，展览会是在他領導下布置的。那一次展览会明确地提出兩個任务：一个是教育宣傳，另一个是搜訪文献。在展览之前与展览期間，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訪問，并且举行了一系列的座談会。由于布置全面，任务明确，就搜訪出了几种具有解决太平天国史上某些問題的作用的文献与口碑。現在周郁先生便根据这些文献与口碑，以及他在揚州地区工作的时期随时随地搜訪得來的一些地方文献，寫成了这一部太平軍在揚州。

我讀了周郁先生这部書，我想向讀者說明它的根据。

第一章太平軍到來之前的揚州，寫的是革命的背景，根据的材料是廣博的文献，从史書到詩歌，从記載到碑刻，还結合到了当地的口碑，說明了揚州地区封建压迫的殘酷，農民与地主階級对立的尖銳化的情况，也說明了当时揚州地区在資本主义萌芽的生長發展中集聚起來的新興市民階層力量的情况。揚州是当时一个商業十分發達的國內市場，也是封建剝削嚴重的地区，叙述了揚州的情况，也就給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背景提供了典型的例証。

第二章三下揚州，是叙述太平天国在揚州地区的有关軍事行动的。这一章根据了一部新發現的專記太平天国在揚州的重要文献——佚名廣陵史稿，解决了揚州是給誰破坏的問題，强有力地指斥地主階級記載的歪曲史实。这一章还根据著者在宝应一帶的实地調查及新發現的臧穀著劫余小記，寫成了一節扼要的過賴文光的精彩的記載。

第三章叙述了太平軍在揚州一帶的各項政策措施。这一章也是根据記載結合調查寫成的。其中記在太平軍第一次撤退揚州后揚州地区的抗租运动，無疑地是受了太平天国革命政策的直接影响，我認為這一項記載在这一章里面是值得注意的。但我們也要指出，太平天国領有揚州只有九个月，时间很短，还在敌人圍攻之中，各項政策措施事实上不会做得多，而有关这方面的記載又極少。即以当时太平天国每克复一个城市就必定立刻分別男營女營設立衙館一事而論，在揚州地区，我們今天也只有得到臧穀劫余小記“諸館林立，有一技皆收錄”的一句記載。所以今天要論述太平軍在揚州一帶的各項政策措施，还没有具备可以說明它的具体情况的材料。

第四章介紹了揚州人民積極參加太平天国壁画和刻書的活动。壁画和刻書是研究太平天国文化藝術上的兩個問題。但是太平天国的壁画和刻書的淵源在那里呢？这又是这两个問題中的主要問題。一九五三年前揚州博物館举办的太平天国史展览会調查清楚了太平天国的壁画出于揚州繪土地廟的藝人之手，而揚州杭家集的雕刻印刷工人又有很多都到了天京去做印刷的工作。这是当时揚州展览会搜訪文献的一个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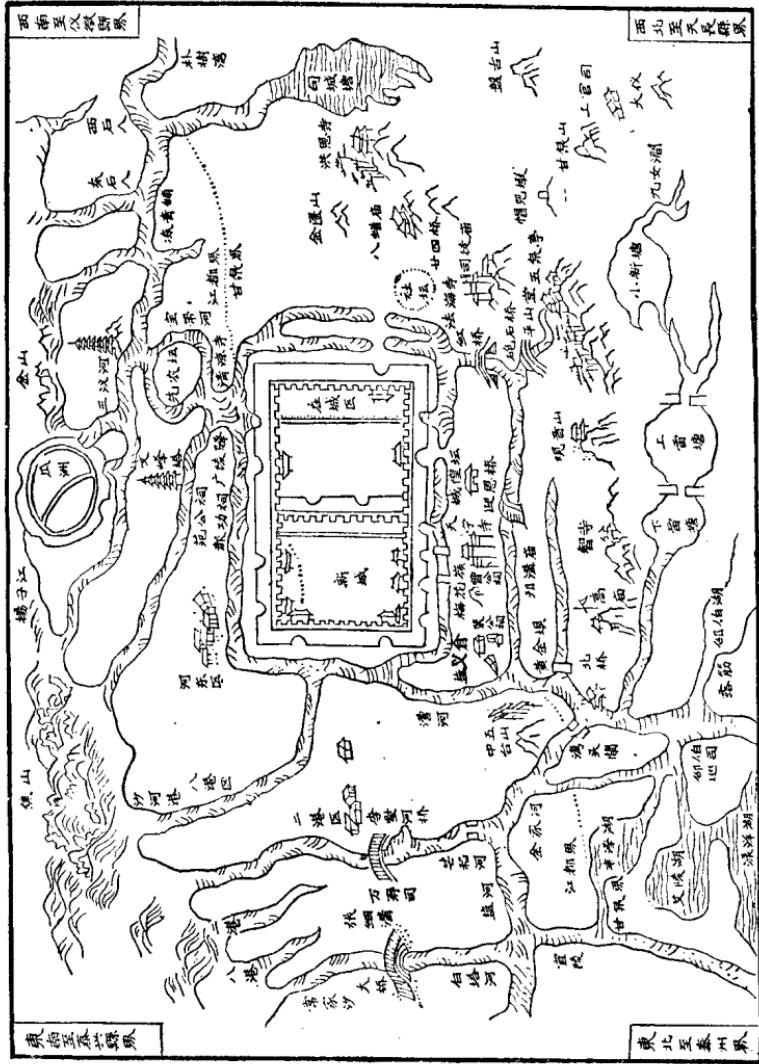
果，周邨先生在这一章里面便把这一成果总结出来。我认为是值得读者重视的。

周邨先生这一部书是根据了新发现的重要文献和调查访问以及多年以来收集到的扬州地区的广博文献来写成的一部著作。以文献结合调查写成太平天国著作这还是第一次。

我因为知道周邨先生操作这一部著作的根据，所以把我所知道的写了出来，以供读者读此书时的一点小小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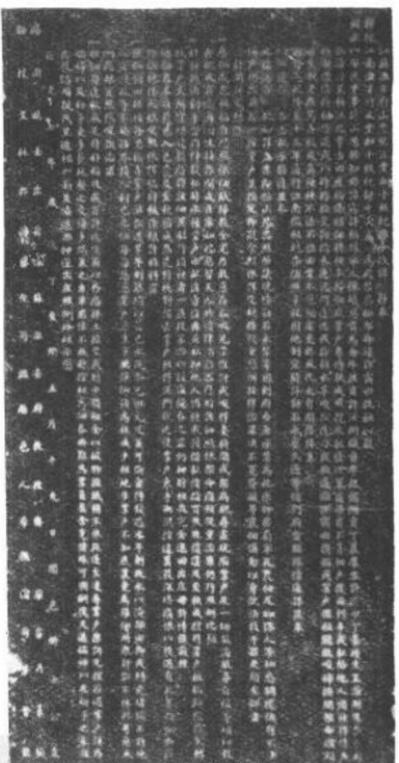
罗尔纲谨志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江都甘泉四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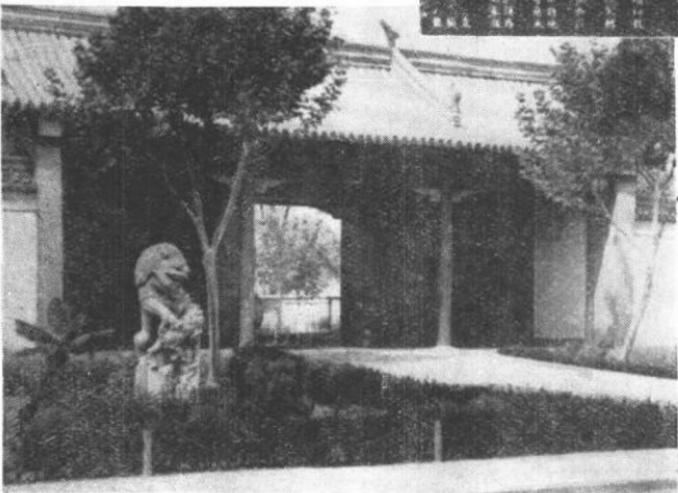


江都（揚州）甘泉四境圖（根據嘉慶“揚州府志”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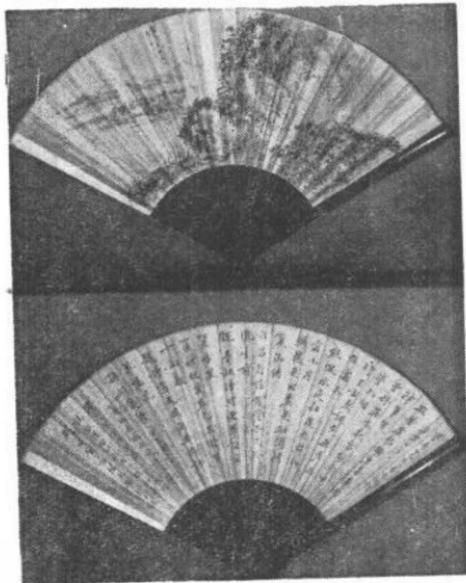
道光七年淮安府山阳县镇压佃农碑（现藏扬州博物馆内）。



太平军第一次进入扬州后最高指挥机关的驻地。



記載太平軍在
揚州活動情況的
詩文稿本書影。
左為“笏菴詩
抄”，中為“刼余
小記”，右為“續
竹枝詞”。



太平天国画家虞步青（虞躉）的
画（一）。



太平天国画家虞步青的
画（二）。

— 太平軍到來之前的揚州

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爆發了大規模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是一次反对清朝封建統治的農民革命；同时，它也对資本主义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斗争。

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發展到爛熟的时期，土地高度集中，貴族、官僚、大地主更加殘酷地剝削農民，过着豪華奢侈的生活，而廣大農民却無衣無食。地主和農民之間階級矛盾已达到十分尖銳的程度。鴉片戰爭以后，再加上外國資本主义的侵入，更加速了農村的破產，農民的生活越來越悲慘了。中國社會本身滋長着的資本主义因素，也与封建腐朽統治处于对立的状态。这些情形使当时社会矛盾更加深化。因此，在南方，有以天地會为主的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在北方，有日漸增長的捻党的活动；此外，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也在繼續擴大。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大風暴。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明确的反封建的和反映民主革命要求的綱領，有嚴密的軍事、政治組織和紀律，并且在前期有坚强的革命領導，因此在金田起义后，只經過兩年左右的艰苦战斗，就迅速地成長为一支農民革命的大軍。太平軍出兩廣、入兩湖，沿江东下，在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進入南京，建立

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并將南京作为首都，改称天京。接着，为了巩固天京，徹底推翻清朝的統治，立即又派兵北伐，由鎮江北渡長江。一八五三年四月一日，太平軍第一次進入揚州城，阻止了南北兩岸敌人的合击，打开了北伐進軍的道路。

太平軍進入揚州，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在揚州一帶，廣大農民遭受着封建勢力的殘酷压榨，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及商人也遭受着压抑和摧殘。处处是破產失業、啼飢号寒的慘狀，处处出現着反封建統治的激烈的斗争。揚州人民早已盼望革命風暴的卷來，改变他們困难的境遇。

封建勢力对農民的压榨和束縛

揚州自唐、宋以來，商業、文化都很發達，是封建統治者心目中一个最好的游乐消閑的城市，所謂“富麗甲天下”^①，这里充滿了窮奢極欲的生活，这样自然需要農民的血汗來供养，所以，揚州也是封建官僚、地主殘酷剥削農民的一个老巢。到封建統治岌岌可危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前夕，这种剥削也达到最沉重的程度。

当时，在揚州府屬各地的土地所有者，很多都集中居住在揚州，像清朝太傅阮元家，就是在揚州北鄉拥有大塊土地而住在揚州城里的官僚大地主。阮元曾經把淹沒在湖里的田，一次就圩起五百多畝。和阮元同时的还有焦循，在他父親手上就已有土地八九百畝^②。此外，包家、汪家、刘家，同样都拥有很多土地。

这些貴族、官僚、大地主長时期剥削農民，非常厉害，如在

阮家就有耕种十一代的老佃戶。这些地主收取的地租往往是剥削了農民一年收穫的一半到一半以上。在揚州西北鄉的山田，以种石为主，每种石合六畝三分，收租石种石麥，秋租脚斗，大小不等，少的七石，多的到九石。在揚州上河的河田，大率分畝呆包，秋季較多，有石畝的規定，其中三熟高田，往往要完兩熟，每畝一季五斗。在揚州下河田產，出入不計畝，以租數为主，年完一熟，大約到畝石之多。这一些田租的榨取，虽一般都有听分减折的規定，实际上是听田主業戶擺布的。而这之外的剥削，如佃戶向地主討种有“頂种”（要交押租）的剥削；如有几百担租的都建有廄口，增多了中間剥削。这一切，实际上加重了对農民的压榨③。

当时，貴族、官僚、大地主階級，依靠对農民的殘酷剥削，过着極度豪華奢侈的生活。

乾隆几次南下揚州，揚州的地主、豪商們大兴土木，尽情鋪張。他們在从揚州北郊直到平山堂一帶，建築了許多亭台館閣、歌樓舞榭，在这一段十里長途上，可以不走雨地。当时，在乾隆的勒索下，揚州的地主豪商一次就獻納几百万兩。而他們生活奢侈的程度，連乾隆皇帝都感到驚詫。

貴族、官僚、大地主倉里的粮食是吃不完的，窖藏的錢也是用不完的。在太平軍入城以前，揚州是“積谷万箱”④，窖藏十万余家，有“千万厚資”⑤。当时，僅一个鹽商包廣亨就有“三四百万金”、而一处的窖就是“十八万兩”⑥。揚州有这样的繁華豪奢，就是封建勢力压榨的結果。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廣大農民却無衣無食，飢餓流离。从現存道光七年的

一塊碑文里，就可以从侧面了解这一情况。当时，農民因繳不起苛重的地租，逼到最后只得喝鹽水，吃毒藥，上吊自殺，这是多么的悲慘，但地主老爺們却誣蔑是“惡佃”；是对歲包租稻的“意存吞沒”；是“坑陷業戶”；人被逼死了的，是佃戶“弄假成真”“心生抬詐”。他們把一切都歸之于佃戶的“惡習”，並認為這是“天人共憤，律法難容”，“應將該佃照依架命圖賴、從重治罪”，租籽還要照例追繳。

當時，廣大農民被逼得無法生活，只好借債度日；借債以後又受債主的逼迫，有時逼得把佃種的田給債主頂種了去，有時田里的收成被債主強收了去，走投無路，非常悲慘，但地主老爺却歪曲情況，惡毒的叫佃戶做“奸佃”；誣說佃戶是“貪圖得錢”，是“擅將業戶租稻歸償債主”。結果將佃戶“治以侵吞侵盜之罪”，不但要將租籽完全追回，還要佃戶退田出庄。如果有誰不照辦，那就是“持橫霸種”，就要罪上加罪。有些農民被逼得只有“泥門”外出，逃難“經年”，過非人的生活。但地主老爺却又叫這是“頑佃”；並誣栽佃戶是“拐去業戶租籽”，認為是“深堪痛恨”；結果是“嚴飭鄉地保人根交，照依拐騙，將稻作銀，計贓科罪”，要追租，還要辦罪。

當時，廣大農民，在佃種土地的情況下，有時得聽業戶的指使服勞役。遇到水旱災的年頭，業戶往往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指使開壩放水或打壩爭水，但當鬧了水利糾紛，甚至惹出人命官司時，地主老爺却又翻眼不認賬，誣栽佃戶“播弄業戶”，把佃戶反說成是“強佃”；認為是業主給佃戶“所惑”；結論是“此等惡風，例應根究”，要“照依唆訟治罪”，佃戶可以唆使

業主犯罪，真是強詞奪理到極點。

當時，農民繳納的租稻，有時偶而有癟谷和泥土，有時繳不全租，只有逼得拿出僅有的破爛家伙什物抵償，這是迫不得已的，但地主老爺却不但不依，還要歪曲事實，叫佃戶做“刁佃”；誣栽佃戶“先將好稻收藏”，硬說是“租為佃吞，田難為業”，倒說成業主“負屈含冤，情殊可憫”。結果是要准“代呈追租”；並還要“差協退田，押逐出庄”，並“照例枷杖示懲”，仍然要辦佃戶的罪⑦。

當時，農民遭受封建勢力的壓榨真已殘酷到了極點。農民為了活下去，就只有起來反抗。在太平軍進入揚州一帶以前，揚州地方同全國各地一樣，農民抗租抗糧的鬥爭，不斷出現着，當時在揚州府屬的太興，就出現了反抗田稅的附加的聲勢浩大的頑強的鬥爭。

封建反動統治下破敗的商業、手工業

在太平軍進入揚州一帶以前，揚州在長時期中發展起來的商業和手工業，在腐朽的封建統治接近崩潰的情況下，也已遭受到嚴重的摧殘，這是當時社會經濟的另一個重要情況。

揚州位置在長江、運河交叉點上，是南北交通的一個樞紐。千余年來，成為一個商業十分發達的市場。揚州有彩衣街、綵子街等，這說明商業中專業分工的發達。另外，交通運輸業也很發達，像作為清朝每年收入大宗的漕米，要通過流經揚州的運河北上，而每年清朝統治者僅額征即達五百万兩的淮鹽，也要經過揚州入長江⑧。在漕運、鹽運的特殊需要下，

就使得市場的繁盛更加突出。當時，僅儀徵十二圩一帶，在鹽運需要下，大商賈、小商販、船民、搬夫及靠着生活的人，就有几万家，几十万人^⑨。在揚州及鄰近一帶，可能有上百万人，是依靠着漕運、鹽運而生活的。

道光末年，太平軍進入揚州一帶以前不久，清朝統治者不顧這上百万人的死活，把漕運改從海道北上，淮鹽也由以中央發給憑証，運銷固定地點的辦法改為由鹽政發給執照、憑証運輸。這樣一改變，破產失業的情況立即嚴重起來，受直接影響的是船工、搬運工，而受間接影響的則是靠這生活的大量市民。沿江一帶，一時形成了大批失業的隊伍^⑩。

揚州手工業一向十分發達，且有了精密的分工。如建築業的發達就是非常顯著的。就這一個行業較大的分工來說，有土作、木瓦作、油漆作、裱畫作、裝修作等。而木瓦作里又分瓦匠、木匠。在木匠里，除大木匠外，還有鋸工、雕工、斗科工、安裝菱花匠；此外還有水磨匠、蕩蠟匠、干磨匠、包鑲匠、旋匠、攢竹匠、鉸匠等，同一個匠作里就有這樣精細的分工。每一個匠作里的人數，當然是很多的。這種情況還不是個別的行業如此，而是比較普遍的^⑪。

揚州手工業的發達，還表現在美術工藝方面，如揚州漆器和絨花是有名的。揚州漆器的品種很多，有雕漆、羅甸、深刻、鈎刀、淺刻、周翥、鑲嵌、描金、結扎等。揚州絨花也包括絨花、絹花兩種，絨花又分有滾絨、燙絨，制有各種花卉、翎毛、人物、蟲魚等。揚州絨花銷路遍及蘇北農村，直到上海、湖南、湖北、安徽、山東甚至內蒙。

揚州的美術工藝，突出的還表現在雕塑繪畫上。清乾隆、嘉慶時期，揚州大興佛寺，由於佛像塑造的需要，當時，佛作的分工，有鋸匠、木匠、雕鑾匠、旋匠；而僅雕鑾匠里又細分做塑工、木工、脫紗匠、包紗匠、彩漆匠、裝顏匠；此外牆上還有繪壁畫的画匠。

揚州的刻書印刷業也很發達。較早的有像清朝官僚曹寅在兩淮鹽務任內在揚州校刻的全唐詩和秘書九種。此後，在清嘉慶年間，在揚州曾開設官書局、刊刻過全唐文一千卷，并刊刻過清官修的明鑑；此外，在揚州開雕的書籍還很多。除了官書局，開書坊的也是不少。這些刻印的書籍，很多都是十分精致的。在這樣大量刻印書籍情況下，刻印書籍的工匠自然也是很多的。像杭家集一地，整莊的人都是做刻書業的。

揚州手工業的發達，加速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刺激了農產品的商品化。

當時，農產品的商品化，表現在糧食的屯積販運上。除此以外，“十里栽花算種田”的情況^⑫，則又說明了大塊農田栽種了鮮花，這自然是為了買賣而生產的。當時，城南桂花庄，城北小茅山、雷塘等地，已成為專業種花的地區。揚州城里，還有所謂“花市”的存在^⑬。

但是揚州的繁榮是不堅實的，多半依靠封建統治階級的享樂與消費，特別是乾隆的幾次南下才發展起來的，大半為消費和服務性行業。而此後清朝統治日衰，“南巡盛典”不再重現，這就使很多服務性行業日漸困難，很多人因此遭到失業的威脅，不能繼續生活下去。到了鴉片戰爭前後，社會階級矛盾

日深，社会危机空前严重，揚州也早已感到不安，又加上漕运、鹽政的改变，就更加不能支持了。

处处是破產失業的人民

在太平軍進入揚州一帶以前，揚州破產失業的現象本來已經十分嚴重^⑭。加重這一情況的，是腐朽的封建統治對自然灾害，特別是水災的防禦和救災的無能，这就影響到迅速加多的破產失業的情況^⑮。

一八四九年，江堤潰決，江水漫溢。揚州一帶發生了大水灾，人民受到很大灾害。

當時，在沿江滾滾東流的水面上，數不清的尸首到處漂流着，無數的災民被大水吞沒或餓死。沿運河線，在揚州盛產米糧的里下河一帶，也出現同樣情況。

一八四八年七月，淮、泗、沂、沂的大水汹涌南下，洪澤湖的水位迅速增漲，沿運河一帶陷入了快要潰決的嚴重威脅中。不久，在歸江五壩中，先後開了車遷等四壩；因水情繼續嚴重，不到四天，又開了昭關壩。這就使得高郵、泰州、寶應、興化、東台、鹽城六州縣境內的大塊地區，全被淹沒^⑯。

這是一場嚴重的水災，但更嚴重的還在人為的加重。

當要開壩放水的消息到處傳開的時候，成百萬的人民，在極端恐怖中，望着一片綠油油快要到手的稻禾痛哭流涕，幾千的庄稼漢，睡在堤壩上，等候着死亡的判決——開壩放水。在水情嚴重到非開壩放水不可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民，把秋收的希望，降低到只要二成到手，好準備度飢救命，提出延期